诗人远去，谁还在校园里唱往日的歌

实习生 庄郑悦 徐嫩羽
本报记者 唐 轶

1996年冬天的一个晚上，来自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京城多家高校的诗歌爱好者把北京外国语大学的一间教室围得水泄不通，里面不时传来雷鸣般的掌声。受邀参加的校园诗人，轮番上台念诗。一首好诗念出，台下欢呼雀跃，鼓掌次数太多，诗人甚至念不下去。遇到表现平平的朗诵，听众也毫不客气地吹口哨、起哄。“有时候台下听众激动了，还自告奋勇冲上去念几首，毫无秩序和规矩，最后淹没在大家的齐声朗诵中，整个教室形成一股强大的气场。”当年就在现场的“70后”彭凯雷时隔十几年说起这一切，还兴奋不已。

至今，彭凯雷还清楚记得，诗会结束后，他约上当时一起写诗的朋友迟宇宙，继续讨论没弄清楚的诗句。北京的冬天寒风凛冽，从北外到人大，一路向北，他们吵了一路，辩了一路，当到达人大校门口的时候，已是夜深人静。

这样的“狂热”不止一次。当年，彭凯雷常常骑着自行车参加诗友聚会，去北大听未名湖诗会，组织全校范围的诗歌大赛……在他印象中，王家新、孙文波、欧阳江河等著名诗人都来过学校做讲座，而老诗人蔡其矫、青年诗人苇岸也会出席诗社的活动。“从讲座到活动，形式虽然简单甚至简陋，但氛围热烈。”

“那时候的我们都特别单纯，只是喜欢诗歌。”彭凯雷说。

就像上世纪90年代曾经流行的《冬季校园》里唱到的，那时，校园里总能看到几个爱情诗人，几个流浪歌手；如今，是否还有人在那里唱着往日的歌？

曾几何时，诗歌是校园的心脏

上世纪80年代，全国高校形成了以北大、复旦、北师大、武汉大学、华东师大、吉林大学、安徽师大等高校为核心的学生诗歌创作队伍，他们创作诗歌、组织社团、创办报刊、印发诗集。高校“四大诗社”中最著名的复旦诗社和江南诗社都诞生在那时。那个年代，大学里也走出了许多诗人：海子、张曙光、沈天鸿、祝凤鸣、西川、臧棣、王清平、西渡……而工人出身的北岛、顾城，他们的作品在学生里的声望越来越高。

成为一个诗人，是80年代很多大学生的共同理想。

在北京，诗人们喜欢到紫竹院和玉渊潭办朗诵会，有几次朗诵会来了上千人。有人在《诗歌报月刊》上回忆了当时的玉渊潭诗会：“一个叫陈凯歌的年轻大学生站在土坡上，风很大，下面听众有四五百人，还有外国记者在拍照，最外圈是警察。北岛示意听众安静下来，可是没有奏效，芒克站起来，用眼光扫一遍观众，下面就安静了。然后陈凯歌激动地朗诵了食指的《相信未来》，北岛的《回答》……”

在上海，《诗耕地》主编陈先发是复旦诗社的中坚分子，他领着一批校园诗人，和专为校园诗人朗诵作品的剧社成员，辗转于上海财经大学、上海外国语学院等校。大学生对先锋派诗歌研读的气氛异常热烈，王寅、陆忆敏、陈东东等一批重要诗人的风格在那个时期形成，一度呈现“80年代学院诗歌幻景。”

“80年代确实是中国诗歌最当之无愧的黄金时代。1995年到1999年，是‘诗歌彗星’的尾巴，好在我赶上了。”彭凯雷说。

如今，在他的办公室里，放着一本已经泛黄的诗集《朋友们》，这是他们那批诗友的“同仁杂志”。当时，他们凑钱印了500本，还偷偷跑到天桥下和书摊上售卖，居然也卖出200多本。有个女生还主动跑来问他们：“这刊物什么时候出下一期，是不是还在这个桥底下卖？”这一句，让彭凯雷突然觉得自己不孤单了。

1999年夏天，彭凯雷在毕业诗作《人大是我的祖国》中写到：“天空干净，草坪干净，人大校园是一个祖国。我听见自己最后的声音在轰鸣，诗人是祖国的心脏。”该诗后来被《人民日报》海外版刊载。

谁还在诗歌中孤独坚持

彭凯雷毕业十年后的人大校园，天空依然干净，草坪依然干净，但诗人不再是“祖国”的心脏。

之后继任人大诗社社长的任牧，艰难维持着诗社的生存。“诗社本来能招收的成员就特别少，一年也许只能招十几个人，不像动漫社、科幻社能招上百人。我进入诗社的时候，周围已经没有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那样的写诗氛围了。”

当时，任牧曾受邀参加中央民族大学、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中央美术学院等高校的诗歌节，他发现，与80年代相比，和他同时代的大学生诗歌作品已经跌落到习作水平。“同学们那阵子要追求的东西太多了，写诗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件投入产出比太小的东西。”

如今，任牧早就踏上工作岗位，也不写诗了。他自嘲，“如果谁在天天工作后，时不时还吟出一句‘今天北京的雨中掺杂着初雪的味道’，那一定被人当神经病。”他用“生活庸俗”来总结他自己的现状，并坦言，如今在各种交际网络上看到他们同一批校园诗友上线时，会立刻闪人，“因为我感到羞愧。”

但任牧知道，纵然他和很多人都有了巨大转变，但对诗歌，依然有人在坚持。

上海的肖水就是其中之一。2004年，肖水到复旦大学读研，复旦诗社前任社长毕业后，诗社交给了刚入学的大一学弟。几个月后，肖水翻看诗社刊发的诗集，惊讶地发现，诗社成员中只有5个人的名字。“如果诗社有需要帮助，你可以找我。”肖水给学弟社长发了一条短信，得到的回复是：“那你来做社长吧。”隔天，学弟把一个塑料袋扔到肖水面前，里面只有两件东西：社团管理条例和入社会员资料，这就是他的全部财产。

手下无将是面临的首要问题，肖水在BBS上发帖：“急招诗社助手，请有意者于明天傍晚复旦校史馆前面的草坪上集合。”第二天，他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走向校史馆，等了几个小时，等来了十几个应征者，其中还包括几个外国留学生。

“如今的校园诗歌环境不尽如人意，90年代末到现在，校园文学生态可以说没有根本性的进步。”肖水无奈地说。

曾经红极一时的复旦诗社社员如今少得可怜；北大五四文学社每年新人不超过5人；武汉科技大学中南分校梅南文学社连续招新三天，竟无人问津。武汉大学“樱花诗赛”、华中师范大学“一二·九诗赛”关注者寥寥，而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奋进者之歌”已停办。

上世纪90年代北大著名诗人胡续冬，毕业后留校任教并长期指导校园诗社活动，他见证了未名湖诗会的衰落。其《北大诗歌在九十年代》一文中提到：“未名湖诗会自80年代一年一届延续，原本是一个在北大范围内挑选出优秀诗作，在诗人登台朗诵之后当场评议颁奖的诗歌竞赛活动，诗会曾多次与崔健的来校演出一样在容量最大的大讲堂举行。但由于此后的校园里写诗的‘瘟疫’一经‘兼职’和TOFEL、GRE的治疗再也未能广泛传播，未名湖诗会开始取消竞赛、评奖过程。90年代以来诗会举办地点的变化极富戏剧性，先是在容纳四百人的电教报告厅，后来换到容纳三百人、条件简易的二教，进而退到容纳一百五十人、设施极其简陋的生物楼101。”

当年那批跟彭凯雷一起爱诗写诗的校园诗人，十几年后也都纷纷远离了诗歌。“诗歌彗星的尾巴扫过，留下一片空白。现在要么是小众私语，要么是隆重的表演，纯粹真诚的诗歌，离校园越来越远。”彭凯雷坦言。

诗歌还能给当代青年什么

“诗社里根本出不了诗人。”中国第一本古典诗词与现代诗合集《诗解毒》的作者宇文珏就读于上海财经大学时，参加了舞蹈、表演、乒乓球、英语等十几个社团，却唯独没有参加诗社。在他的大学生涯里，所在的校园根本没有诗歌环境。他隐约记得隔壁的诗歌社在他打CS的时候搞过几次活动，但是稀稀落落的成员和格调，连他都没有影响到。“根本无法学习和交流。”宇文珏的大学创作是孤独的，写诗是一种闭门造车，而周围知道他会写诗的人只有自己的女朋友。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的吴伟元认为，诗社的组织者没有组织好活动，没有在上面下工夫。现在的一些文学社社长关心的都不是文学本身，而在关注保研、加分等东西。

中国传媒大学学生吴优在很多人眼里是个“文艺青年”，他热爱读书、常常写一些感性小文，却从不写诗。他认为，好诗需要深刻的生活和感悟，作为学生他还没有，所以写不出来，而现实也让他对诗不感冒：“八九十年代的大学生们会思考‘怎么样做个有用的人？生活的意义是什么？我是谁？’咱们现在关心的是什么？我要找什么工作，以后在哪发展？我要怎样才能挣更多钱？这些想法是主流。”

北京语言大学刘超谈到，“商业电影胜利了，通俗小说胜利了，流行歌曲胜利了。并不是说商业通俗流行一定不好，照样有高手能在真诚和商业间游刃有余。这里的矛盾在于，在嘈杂喧嚣五光十色让人应接不暇的尘世里，诗歌如何走钢丝？”

其实，有很多人在尝试挽救诗。

2007年，肖水发起成立“在南方”诗歌传播机构，继续致力于在“长三角地区”开展针对大学生的诗歌义务传播活动。

中国传媒大学文学院教师王永试图提高学生们对诗歌的热情，他将古代文学和当代传媒结合，让学生用当代传媒的方式演绎诗。在他的课上，他给学生看自己写的诗，让学生为诗做视频，布置“古代诗歌和现代流行歌曲”的论文，也鼓励学生写诗。

宇文珏认为，诗的尴尬在于无力，应该让诗歌借流行元素重归大众。“不是青年远离了诗歌，是诗歌远离了青年。”宇文珏的博客上晒着自己新创作的各种诗和乐，“诗歌有用，诗人有为”，宇文珏正在尝试古典诗词和现代诗（歌）的结合、诗歌与生活的结合。他甚至出版了一张诗与乐结合的专辑《诗的歌》，并走进大学校园里办演唱会，与大学生互动。

“不要问当代青年能为诗歌做什么，应该问，诗歌还能给当代青年什么？”对诗歌未来，彭凯雷还是持乐观态度。但他觉得，现在能看到的诗能引起共鸣的太少，能连结普通人心声心绪的太少。所以被嘲笑都是正常的。“21世纪的学生比我们当年的眼界更开阔更高远，但面临的环境与世道却更复杂更无奈，他们更渴望像李开复这样的成功人士作为精神导师，单纯的文学青年难以引起学生内心的共鸣。”

批评

“千余汉语词条入选牛津词典”的文化幻象

胡印斌

牛津词典中汉语外来词破千？2010年年底，一则据说是来自外媒的消息，引发国中诸多文化人的感慨。据说，到2010年末，牛津英语词典收录汉语外来语突破1000条，包括“不折腾”、“人肉搜索”、“三俗”等在内的流行语均被牛津收录。然而，旋即就有专家指出，所谓的外媒消息，其实来自国内媒体发表的厦门大学副教授文章，根本就是乌龙一场，该副教授也表示，是翻译出了误差。更让人扫兴的是，牛津英语词典在线支持经理罗斯披露，从2001年到2010年，牛津英语词典只收入了一个汉语词条：“枸杞”。

此前，国内很多媒体纷纷采用的那条消息这样写道：“这几年，随着中国影响力的提升，外国人逐渐开始关注中国发生的时事和文化现象。牛津词典的编委会顺应了这一趋势，并对一些中国媒体或网络流行词加以收录。”——建立在“影响力”、“顺应趋势”之上的意图阐释，确实很喜兴很提气，中国崛起了，连一向保守的牛津词典也开始“顺应”趋势了。遗憾的是，这不过是一种基于一厢情愿的幻象而已。

从1000到1，这出“热词留洋”的喜剧刚开头就煞了尾，其间巨大的差异不知让谁汗颜。只能说，“枸杞”是个好东西。

这些年来，类似“汉语强大了”之类的乐观假新闻并不鲜见。早在2008年，就有消息称，牛津英语在线词典将上海常用词“嗲”收入，据说，“dia”因为上海这个国际大都市的知名度而被收录。事后证明，这不过是一名大学生的恶搞而已。

审视此类事件就会发现，牛津是否收录热词，甄别查核起来并非特别艰难，何以那么多媒体和社会公众都会自然而然地相信这样的不实报道，而没有去做一点最基本的查验功课？英语不是障碍，牛津也并非天书，真正可怕的，并不是牛津到底有没有收录汉语外来词，而是大家显然都愿意相信这样的内容，即“牛津确实收录了大量汉语外来词”、“牛津本来就应该收录大量汉语外来词”。也就是说，影响媒体和公众做出正确判断的，并不是基本事实，而是虚幻的、患得患失的文化自信。

不客气地说，在很多人的意识深处，还是隐隐约约存在着某种“被认可”的情结。盖由于长期以来，中国的积贫积弱使得国民与外界缺乏平等的交流，具体到对文化的影响上，也越来越缺乏自信。要么敝帚自珍，妄自尊大；要么自轻自贱，文化虚无。流变衍生至今，虽然国家已经融入世界潮流，影响力与日俱增，但在文化上，其拘执于自大抑或虚无两端的情形，似乎并无太大改观。纵观时事，自大者以传统资源为经济之道，虚无者则每每以西为贵，视传统为敝屣。二者的共同之处，即在于文化上的进退失据、高度不自信。

如此语境之下，“牛津收录”事件及其传播过程愈发显得耐人寻味。一方面，对于牛津词典收录汉语词汇现象，往往过于乐观，甚至将其升华为中国全球影响力的提升；另一方面，也流露出一种过于看重外界认可的心态。其实，这样的表现大可不必，牛津词典自有其遴选词汇的原则，而中国文化的影响力也自有其发生发展的内在脉络，未必就会因为一部词典的收录多少而有所损益。

言及此，不免联想到这些天讨论热烈的删节《三字经》等传统典籍事件。这一“删经”事件已经演变为一场传统文化如何取舍的混战。当下社会是不是应该在教育系统强行推广读经？从什么时候起，我们丧失了中国文化的自信力，开始了对一代又一代学子保姆般的过度护持？

透过“牛津热词”、“节本三字经”这些纷扰的文化事件，不免产生深刻的怀疑，中国文化失去了自信力了吗？不然，何以一则以喜、一则以惧？过分计较他人的态度，总是患得患失，希望得到人家的认可；过分不自信青年学生的鉴别力，总是存有保姆心态，唯恐国人会迷失在文化的十字路口。前者的典型例证还有国人的诺贝尔文学奖情结，后者的典型例证即是挥之不去的精华糟粕论。二者都低估了民众的文化原创能力和甄别能力，无助于新世纪中国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而落入虚妄的文化幻象之中。

看得见“中国”的房间

1月2日，上海世博园内的原世博文化中心更名为梅赛德斯—奔驰文化中心，当日起全面开放。奔驰文化中心可分隔形成不同规模的观演空间，在该中心可以隔窗远眺中国馆。 杨 毅摄

对于这个春节，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复杂情绪。有网友总结：春节回家，是对大多即将踏上旅程的国人的人生综合能力考试。考试内容包括社会交际能力，经济能力，人格承受能力。

过的是春节还是“春劫”

本报记者 张黎姣

近日，在新浪微博上，“春节过年你都会把钱花在什么上？”和“春节回家你会给父母多少过年钱？”这两组投票引起网友关注。截至1月10日，已有近四百人参与投票。结果显示：给父母、晚辈红包，以及犒劳自己，成为多数网友春节的主要花费，而给伴侣一掷千金送惊喜、拜访岳父岳母的人数比例只占3%和5%。73%的网友表示将给父母1000元以上的红包。只有21%的人选择拿出500元以下孝敬父母。

不少年轻人开始盘算一笔过年账：封红包、买车票要搭钱；家人聚会、朋友聚餐要搭时间……金钱和情感的投资，让许多年轻人开始犹豫：过年回家是否能值回票价？这些对过年回家有恐惧感的年轻人，被称为“恐归族”。

一个名为“花花的尾巴上”的“恐归族”就发表了这样一条微博：“我是不是很卑鄙？我特别希望今年春节再下大雪，这样我就不用回老家了。不用喝酒、不用给红包，只要寄钱给老人就行了。”

然而“恐归族”是否用金钱就能带给家中老人“终极关怀”？

在北京松堂关怀医院，下午四点，年过80的王爷爷刚从佛堂拜佛回来。“过不过节都一样。我有三个儿子、一个闺女。他们平常都特别忙，很少有机会来看望我，过年我就留在松堂。”在他眼中，松堂就是他的家。

许多老人无法经常得到子女关怀。近日，在《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的修订草案中，就加入“家庭成员不得在精神上忽视、孤立老年人”的规定，并强调“与老年人分开居住的赡养人，要经常看望或者问候老人”。

孝道要靠法律来约束，这背后是否也有年轻人自己的苦衷？

年近30的广告公司制片人赵黎至今单身。由于工作繁多，春节放假时间短，赵黎准备年后再请假回家。“我觉得在北京过年挺好的，清静。而且我现在还是单身，父母还经常打电话催我找个男朋友，要是回家了，亲戚朋友问起来，我真受不了。”

从河南小城市走出来的大学生步春毕业后选择在早教机构做一名幼师，而这在父亲眼中简直不可理喻。春节前，父亲叮嘱她，不能在亲戚朋友面前说自己是幼师，至少也要说是小学老师。加上过年还要给老人和小孩包红包，收入并不高的步春打心眼儿里害怕回家。

而有些已站稳脚跟的年轻人，也不愿意回到自己曾经生活过的“小旮旯”。

“过年就不回家了，不敢回去，我怕回去看见‘自己’。”大学教师张勇的老家，在一个落后的镇子里，去年回家，他就发现自己在家乡“不适应”了。“除了吃喝，我不知道该跟爸妈交流什么。我和老家的朋友，也没有共同语言，说什么，他们也不知道。还有些亲戚朋友，见我现在混得好了，就来求我办事，春节变成‘春劫’。我实在不愿意相信，自己就是那儿的人。”没有网络，信息闭塞，也让“现代化”的张勇不知所措。

对于这个春节，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复杂情绪。网友“玛拉喇嘛”总结：春节回家，是对大多即将踏上旅程的国人的人生综合能力考试。考试内容包括：社会交际能力，经济能力，人格承受能力。考试期间，必须保持充足的体力，保持面对一切触动人类情感事务时毫不动摇的冷漠之心。

有人为春节忧虑重重，也有人泰然处之。王达是公司白领，虽然年前聚会扎堆，还要去给亲戚买东西，但他却丝毫不愁：“我没有压力，给父母买礼物有心意就好，没必要太贵重。”在他看来，“恐归族”的恐惧都源于面子问题。要是为了过年，非砸锅卖铁搞“面子工程”，搭上的只有自己。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夏学銮认为，年轻人的“恐归”心理跟他们的价值观不无关系。“老一辈人对乡土的怀念单纯而深厚，现在的情感有些物质化了。因此，物质和情感的双重付出让年轻人有些不堪负荷。”夏学銮认为，大部分家长还是希望孩子能常回家看看的，儿女们应该给自己的情感“减负”，踏实回家。

除了减轻孩子过年回家时物质方面的压力，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广播电视系副主任颜梅指出，呼唤文化上的价值回归也十分重要。" 在端午节、重阳节等传统节日重新受到重视的同时，我们对春节传统文化的发掘反而弱化了。像庙会，好像定格在食品买卖，而缺少了对传统文化和古老文明的展现。” 颜梅认为，也许是我们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和原来不一样了，才使得年轻人误以为带着礼物回家才能体现孝心。

“如果春节真是场大考，劝各位考生，保持淡定。孩子们别多心，不用包红包、买新衣、拎着豪华礼，爸妈不是周扒皮；爸妈们也莫着急，别问年终奖、考第几、啥时办婚礼，孩子不是答录机。”网友gabriel在微博中调侃说。“父母们，喊天下的孩子回家吃饭吧！吃过饺子，春天也就不远了。”

麻辣一周

林 蔚

陆川主动认炒作

导演陆川的新片《王的盛宴》正在筹拍，虞姬一角的海选活动开展得轰轰烈烈。陆川向媒体透露，海选已进入最后一轮，剧组方面敲定了几个大致人选，并特地强调投资方没有“塞人”。声势浩大的海选被不少媒体质疑为“炒作痕迹严重”。对此，陆川主动坦承“确实是炒作”。他表示如今是注意力经济时代，活动有宣传的成分在里面，但保证最后会选用没有任何经验的新人，并使结果经得起考验。据悉，《王》剧计划在一月中旬开机，男主演暂时保密，虞姬人选也要等开机一个月后才对外公布。

点评：既然是痕迹明显的炒作，那与其遮遮掩掩，还不如坦白从宽。陆导一招主动出击，既搏到了版面，又为宣传加分，还为接着炒作男女主角预留了话题。包袱一个接一个地抖，看来导演果然是个中高手啊。

情感类节目多靠演

2010年，婚姻情感类节目在全国荧屏如火如荼。进入新年后，此类节目行情依旧看涨。不过日前有媒体称，一些节目的真实性值得怀疑，且弄虚作假的成分越来越多。记者调查发现，不少节目中离婚、吵架等戏码多是由表演系大学生担纲。有类似经历的学生表示，节目方喜欢找表演系大学生是因为他们价码低，而且演起来得心应手。有电视节目制片人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如今电视台收视竞争激烈，一些情感节目采用日播方式，选择“演”也是无奈之举，因为请当事人上节目需要大量沟通工作，得不偿失。

点评：不用媒体点拨，群众们也早看出情感类节目之假，而且作假之风由来已久。之所以还有人捧场，不过是当小品剧看，图个乐子而已。这才是情感节目能够长久生存的最主要原因吧。想骗过观众的火眼金睛？难！

小崔握手小刚

崔永元与冯小刚曾经因《手机》一戏公开撕破脸，不过双方日前已握手言和。据报道，新版《小崔说事》在元旦期间录制冯小刚专场，冯导演大大方方带着重量级团队出场。崔永元接受采访时坦言，其实两人私交甚好，之前所谓的“矛盾”早已淡化。“我俩谁都不提。这次我给冯导打电话，说来录个节目吧，他就带着一干明星大腕儿来了。我们上岁数的人会从容处理矛盾的。”据悉，节目录制完成后，冯小刚还向崔永元的电影博物馆捐赠了很多道具。

点评：先跟朱军道歉，后与小刚握手，“实话实说”的小崔转眼已成温吞吞的中年大叔。岁月果然是把杀猪刀啊。不过能一笑泯恩仇的，大多是资深武林高手。小崔功力之深厚，那是近日到处示好的郭德纲可望而不可及的。

央视犀利影评惹争议

央视品牌栏目《第十放映室》新年推出的《恭贺2011春季篇》因语言犀利，引发网友热议。据介绍，节目在点评知名电影时，措辞激烈，与央视一贯的温吞水风格大异。比如称电影《苏乞儿》为“精神分裂型叙事影片”；《气喘吁吁》“以一坨没有被消化掉的狗粮姿态”……多数网友表示，《恭贺》这样的影评相当给力，大大提升了栏目的可看性，并表示还会继续追看。但有少数网友认为，主流媒体应该注意节目的尺度把握，太过网络化和情感化的语言不宜出现在央视节目上。

点评：老夫聊发少年狂，本就是件可喜可贺的事儿。何况大过节的看个娱乐节目，大家会心一笑就好了，实在不必太较真儿。至于尺度问题，您放心，有关部门时刻用心把握着呢，能露面的都是经过审核的，无妨。

《中国民歌榜》提倡“大概念，宽民歌”

本报讯（记者**张黎姣**）1月4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十佳文艺栏目”《中国民歌榜》节目主题曲在京发布。《歌声飘过草原》和《生生不息民歌王》两首歌曲共同入选。

《中国民歌榜》提出“大概念，宽民歌”的理念，其节目内容既包含原汁原味的民族传统民歌，又有体现新时代风格的新作品。《生生不息民歌王》就是一首带有摇滚曲风的民歌。

据介绍，《中国民歌榜》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台湾广播中心文艺部制作的一档公益性音乐节目，填补了对台湾广播节目中民歌节目的空白。两首主题歌发布后，也将在《中国民歌榜》节目中滚动播出。

把古城搬到纸上的80后

通讯员 倪俊峰
本报记者 陈 强

在人们的印象中，从事碑刻拓印的，多半是文物考古方面的老专家。可在闽南历史文化名城福建泉州，却有一位“80后”，深深地迷上碑刻拓印。

走进许著华的家，地上铺满了他亲手制作的碑刻拓片，这些拓片都是他一张张从千年古镇安海的文物古迹上精心拓印下来的。有人不解：小许为什么要花大力气去拓印这些碑刻呢？

这位土生土长的安海人告诉记者，2008年夏天，当地有关方面重修安海石井书院时发现一方明代碑刻，碑刻的内容与《安平志》上记载有所出入，这触动了当时还在闽江学院环境艺术设计专业大三学生许著华：“不及时把相关碑刻记录下来，以后会留下遗憾。”于是，他开始琢磨着用什么办法记录下这些老祖宗遗留的宝贵财富。

小许先尝试用摄影、素描等方式，但实践后发现这并非最佳途径。他试着用拓印的方式，把这些碑刻从石头上搬到纸上。

小许无师自通，居然通过网络视频掌握了拓印这门古老的技艺。虽然拓印的操作流程并不复杂，但刚涉足这一领域的他还是遇到了一些困难，纸张的选择、拓包的制作等等技术上的细节都需要他用心去体会。“拓第一块碑刻是比较惨的经历。”许著华回忆说：“那是冬天在一个比较荒凉的地方，带着头灯，拿着拓包在那拓印，一直做到深夜两点，其中的甘苦只有自己知道。”

拓印不仅是个技术活，也是个体力活。从2009年初开始，许著华利用假期和周末时间经常重复着这样的流程：登上高高的梯子，将浸湿的纸张，敷在石碑上面，用刷子轻轻敲打，使纸入字口，待纸张干燥后用刷子蘸墨，轻轻地、匀速地拍刷，拓印着一方方碑刻。酷热的太阳，晒黑了他的脸庞，寒冬的海风，吹干了他的嘴唇，而户外作业的辛苦并没有使这个年轻的古迹保护者放弃。

两年时间，许著华和他的“拓友”们在明代安海古镇的疆界面积超过100平方公里的范围内，拓印了200多方碑刻。其中最大的一块碑刻，立于晋江市南天禅寺正殿门廊西侧的《重修岱山南天禅寺碑记》，碑高313厘米，宽达148厘米。许著华和一个“拓友”花了将近4个小时才将其拓印在纸上。

令小许自豪的是，去年受中国航海博物馆的委托，他和“拓友”拓印了泉州九日山上的祈风石刻，让家乡的历史走进了位于上海的中国航海博物馆。

碑刻拓印，并没有给小许带来任何的经济报酬。“最大的回报就是让历史文化得到保护与弘扬。”许著华说，他挑选了150多幅安海碑刻拓片，整理编辑成《安平碑拓录》一书，该书即将付梓，为研究安海古镇的历史提供了详实的资料。

11个新险种为文化产业保驾护航

本报北京1月10日电（记者**王晶晶**）今天，记者从文化部获悉，按照《关于金融支持文化产业振兴和发展繁荣的指导意见》要求，保监会和文化部将共同组织开发、分批确定文化产业保险险种，并推进有关试点工作。首批试点的险种为11个，其中包括演艺活动公众责任险、演艺活动取消险、艺术品综合保险、文化企业知识产权侵权保险等。这些新险种的增加将为文化产业发展的投融资体系提供保障。

2010年，我国文化产业增加值近1万亿元，与2008年、2009年相比增长近10%，文化产业正在向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发展。与此同时，文化产业融资困难的问题依然存在，风险管理方面有待健全。据悉，除此次公布的11个险种外，文化部与保监会还将支持寿险公司开发为文化企业提供人才激励配套的养老和医疗保险险种。